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

现实与哲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哲学基础

主编 孙伯镁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编

现实与哲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主编 孙伯镁

副主编 赵常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南京

(苏)新登字 011 号

现实与哲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主编 孙伯镁

副主编 赵常林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扬中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35 千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305-02814-2/B·137

定价:12.00 元

(南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现实与哲学》编委会

主 编 孙伯鍨

副主编 赵常林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庄福龄 孙伯鍨 赵常林 胡福明

施德福 梁树发 黄楠森

前　　言

开始于 80 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进程，经过历时 14 年的非凡努力之后，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展示了辉煌的前景，举世为之瞩目。1992 年春初，邓小平同志在巡视南方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谈话，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再度推向高潮。同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以最显著的地位概括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1993 年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1994 年，时值邓小平同志 90 寿辰，为庆祝这位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设计师的崇高业绩，在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广泛研究和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运动正在深入持久地进行。可以预计，随着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能自觉而清醒地用这个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把全党和全国的各项工作都统一到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之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必将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从而实现我们的宏伟战略目标。

社会主义自古就是人类向往的理想，只是到了近代，它才成熟为科学的理论。把理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直接的社会实践，主要是 20 世纪的事情。然而，正是这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经历的是一条艰难险阻、荆棘丛生的道路。列宁开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随着伟人的离世，它的光辉就

渐渐地暗淡了下来，终于在庸人们的手里被葬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有着辉煌的开始，在本世纪 50 年代的最初几年里，它就在中国的大地上牢牢地奠定了根基。一个古老的民族从此又开始了历史的新生。然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尽管一出生就认识到自己的困难处境并为此而格外地奋力拼搏，但是失误和挫折却还是一再地出现，使人困惑，发人深省。于是，当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一个伟大的思想就处在孕育之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改革。以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走上了一条崭新的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为这条道路指明方向的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 1956 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经过了 22 年。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用了 22 年的时间，通过大胆的尝试和不断的探索，经历过多次失误和挫折，最后才终于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不是轻而易举的，没有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的大胆突破和锐意创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能至今还会在“左”的指导思想的迷雾下陷于困境。所以，实践证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实际的光辉结合，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学习、研究和宣传这个理论，以它为指导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本书就是为此目的集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而编成的。

编 者

1994 年 8 月

本 书 作 者

- | | |
|------|-------------|
| 第一章 | 崔自铎 |
| 第二章 | 李君如 |
| 第三章 | 庄福龄 |
| 第四章 | 孙伯镁 |
| 第五章 | 许全兴 |
| 第六章 | 朱传棨 |
| 第七章 | 秦维红 |
| 第八章 | 侯惠勤 |
| 第九章 | 高为学 |
| 第十章 | 邓兆明 |
| 第十一章 | 艾福成 |
| 第十二章 | 支运春 |
| 第十三章 | 张文煜 |
| 第十四章 | 杨 韬 |
| 第十五章 | 黄楠森 |
| 第十六章 | 韩庆祥 |
| 第十七章 | 汤洪海 于少楠 |
| 第十八章 | 张桂岳 周安伯 邱飒爽 |
| 第十九章 | 张建华 |
| 第二十章 | 赵常林 |

目 录

第一编 “南巡谈话”的启示

第一章	总设计师的新贡献	1
第二章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	16
第三章	“精髓”论的由来和发展	29

第二编 理论和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第四章	坚持唯物主义 反对唯心主义	44
第五章	坚持马克思主义 反对教条主义	60
第六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	77
第七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源	88
第八章	理论和实践统一问题的历史考察	98

第三编 辩证法也是改革的代数学

第九章	改革中的几个辩证法问题	121
第十章	主要矛盾理论与战略中心转移	135
第十一章	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党的基本路线	148
第十二章	现阶段的阶级矛盾问题	160
第十三章	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辩证法	172
第十四章	社会现代化与观念现代化的辩证法	189

第四编 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突破

第十五章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哲学问题	202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人的建设	219
第十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	234
第十八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理想教育	247

第五编 腾飞中的苏南乡镇经济

第十九章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头雁	261
第二十章	“华夏第一镇”的胆识与智慧	278

第六编 改革开放与苏南经验

第十一章	苏南模式的形成与实践	291
第十二章	苏南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308
第十三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325
第十四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342
第十五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359
第十六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376
第十七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393
第十八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410
第十九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427
第二十章	苏南模式的实践与理论	444

第一编 “南巡谈话”的启示

第一章 总设计师的新贡献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巡视南方途中，陆续发表了一些重要谈话。这些谈话对由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实践作了最新的概括和总结，是我们学习和探索邓小平同志最新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依据。归纳起来，这次谈话主要包括下列几方面的内容：

一、改革的实质和作用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极为明确的回答。他认为，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他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可见，解放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当然，他过去也谈到过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但那是就具体领域的改革来谈的，例如，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方面谈及这个问题，而在“南巡谈话”中则从改革的全局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新的论断。这就使问题上升到了哲学理论高度。

邓小平在论及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是将这一论断同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相提并论的。他认为，过去搞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现在搞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既然改革和革命一样，都具有解放生产力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党的十四大报告扩展了这一结论：“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指，它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彻底转换，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自然也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贡献。

如果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动力，那么搞好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领导、在班子、在人。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一个真理。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经验，无论从宏观（全国）、从微观（一个单位）来看都是如此。

另外，要搞好改革开放，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解放人的思想，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富有创新精神，勇于进行改革实践。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高度赞扬了深圳特区的成就和深圳人的精神，即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和好路，就干不出一番新的事业。深圳精神的实质，就是他们能够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敢于创新、勇于实践。这是深圳特区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宝贵经验。

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它要求人们具有首创精神，不断开拓前进，进行创新实践。特区经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敢于创新。从经济发展速度说，1991年我国的四个经济特区年工业产值增长率为36.5%。从广东省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看，无论是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都高于香港地区和台湾省6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发展速度。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与人民群众的创新实践分不开的。

当然，创新会有风险，这不要紧，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通

过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使人们变得更加聪明，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建设方法和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在论及改革开放的实质和意义时指出：这是“一场新的革命”，“它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微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就是说，从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看，改革是其量变发展过程的动力；从社会主义体制（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看，改革则是其质变发展过程的动力。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既不能借口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反对改革开放，也不能借口体制改革而蚕食鲸吞社会主义制度。

二、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计划、市场与社会基本制度的关系，是改革实践中遇到的一个复杂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对此发表了新看法，并把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他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这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的论断，解除了用计划和市场来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但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依据传统观念，人们必定会提出上述问题。对此必须作出回答。由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按资分配、贫富分化等，而市场经济不是必然要产生上述现象，因而邓小平同志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

等，而所有这些也并不都是计划经济的共生现象，因此，他又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像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认识一样，人们对市场、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长期以来，市场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甚至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而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其实，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列宁曾经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① 所以，市场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以市场为中心组织经济活动，是任何一种商品经济形态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同样离不开市场。如果把问题说到底，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必然要承认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就是市场经济。

从现实情况看，资本主义可以利用计划，但它不可能在公有制基础上搞计划；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但它不能在私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搞市场经济。所以，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第二，它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手段相结合的。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需要认真抓好的四个基本环节，进一步把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是手段的思想具体化。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

^① 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3页。

义的本质这个问题，而是紧紧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来谈的。这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提出，是同把计划与市场都作为经济手段，可以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运用这一情况直接相关的。因为，既然认为计划与市场能同时为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所利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两种对立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呢？这一问题的提出，势必要求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对于这个界定，应当作全面、准确的把握：既不能把上述三项内容割裂开来，也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更不能任意抽取其中某一点，而加以曲解。

这里有个现实的实际问题，就是如何依据上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去看待股市和证券等等现象？回答是允许看，坚决地试，在实践中决定取舍。但是总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使社会主义最终取胜。这点非常重要。

为了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必须利用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的规律，而又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等。

如何能做到正确对待和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呢？这里有几点属于方法论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对一切认识领域的文明成果，要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加以检验，然后决定取舍；

第二，对一切属于行为方式方面的文明成果，如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要运用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标准加以检验，然后决定取舍；

第三，要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为人类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而不是兼容并包，不加分辨地照搬、照抄外国已有的东西。

总之，无论是对待我国已有的或是对待外来的文明成果，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四、关于姓“资”或是姓“社”的问题

姓“资”和姓“社”，如果应用不当，或者将它抽象地加以应用，就会像一个“紧箍咒”一样，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束缚住，动弹不得。因此，便有一个姓“资”或姓“社”的标准问题。邓小平同志谈到的姓“资”姓“社”标准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它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中的成败得失究竟如何加以判别，应该以什么作标准，而并非用它来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这点必须十分明确。比如，独资企业姓什么？当然姓“资”。然而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它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资”，所以，它就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有益补充。因此，我们就要引进外资，实行开放政策。

关于姓“资”姓“社”的三条标准，其实就是判别改革开放政策的成败得失标准的三项内容。主要是指：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上三条标准，实质就是一个生产力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也内在地包括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特征，因为在三个“有利于”前边的“社会主义”的限制词，就指明了这一点。

要正确地把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判断改革、开放政策的成败得失的标准，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要注意它们对于发展生产力是有利，还是有害，如有利，还要看是有大利还是有小利。第二，要注意它们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结果，是利还是害，是福还是祸，如果带来的是福和利，还要具体地看是大福、大利，还是小福、小利。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可以在各阶级、阶层之间作出一些利益关系的调

整，给群众一点小福、小利，但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维护和代表劳动群众的利益，这是一条法则。第三，要注意把这三点和邓小平同志的其他言论联系起来加以理解，避免得出片面的结论。

用邓小平同志的三条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特区和“三资”企业，就会得出结论：特区的政策，以及它的成果姓“社”，不姓“资”。因为十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些政策和做法为特区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人民生活得到了大的提高），为生产力高速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为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特区那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外资企业只占一部分。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从广东省三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的经济发展情况看，自1980—1989年，工农业总产值由1.5亿元增长到134亿元，增长73.78倍；同期，国民收入由3.28亿元增至183亿元，增长55.79倍；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深圳人均月工资，由1980年的82元增到1989年的326元，提高三倍多。

再就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三资”企业？

有人认为，搞“三资”企业是“倒退”，是发展资本主义。这种认识不正确。因为它不懂得判断我国搞“三资”企业及其政策的标准，应以三个“是否有利”为准；不懂得一定要把“三资”企业放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历史背景中去观察、分析；不懂得要从我国现有的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去看待问题。在我国当前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于我们有着政治、经济与政策方面的优势，我们搞“三资”企业，实行开放政策，不但不会走偏方向，而且还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承认“三资”企业，利用其积极性，用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一切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来发展自己。广东省的经

验证实了这一点。从广东省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从1979—1987年，共利用外资55.3亿美元，利用外资兴办企业6016家，占全国“三资”企业的60%以上。据广东同志测算，9年来广东利用外资新增产值553亿元，占同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0.6%。截止到1987年，广东省投产的“三资”企业为1600家，工业总产值为63亿美元，出口创汇16.5亿美元。在广东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为100余万。这些事实说明，在我国兴办“三资”企业，是于我有利的。所以我们才得出结论，我国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五、关于加快经济发展

过去，毛泽东讲过：经济落后就要挨打。在当前新的国内国际条件下，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经济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后退”。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很明显，如果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暂时地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边，还可以说得过去，人们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再过20年或稍多一点的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落后于原来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周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那时，我们将如何向人民交待，如何去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考验。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党的十四大报告的一个中心议题。

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上。90年代，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当前，从国内国际形